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五期 ——  
(二〇〇六年九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9c)

【不堪回首】“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章立凡
【史实辨析】对一份“文革”传单의 考辨	王海光
【史海钩沉】“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	廖述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不堪回首】

“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 章立凡 •

〔题记：本文原是本人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后应某大周末报纸约稿改写，排好整版清样，终审时被主编枪毙。此文遂论落坊间，两年前被“燕南网”捡到贴出；又被某大网站转载，跟帖数千，忽一夜删尽；但各大网站旋即轮番转载，遂谬种流传，无法尽焚矣。〕

前因此文非获本人授权公布者，但流传既广，也只好默认这个现实，一直采取不闻不问态度。今年适逢“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为深刻反省历史，遂订正个别错误，正式予以公布，略补国内教科书之讳言。

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历史研究也从来不是“宜粗不宜细”。希望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能够勇敢地拿起笔，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避免民族的“集体失忆，共同以史为鉴，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公民社会。”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 ◇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老人家后来总结说，“一生办了两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办成时，他在这里主持了开国大典。据说大典之日原定为1950年1月1日，老人家改为1949年10月1日，即夏历丁丑年的甲子日。这个日子选得不错，本共和国至今已度过五十五个春秋。这回发动“文革”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错了皇历。古来年值“丙午”、“丁未”称为“红羊劫”，当天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将八亿中国百姓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成为伟大领袖一生最大的败笔。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

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 ◇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

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 ◇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说过自己“红八月”经历，再说周边友人。父亲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叙述了，我要讲的是两个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人家。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在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娇小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

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高级民主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稚，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白包，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止，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

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 ◇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XX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

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騄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2004年10月12日 改写于风雨读书楼

~~~~~

# 【史实辨析】

## 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

• 王海光 •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WG）”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署名“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WG”史和“WG”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该文夹杂在中央党校每日大量收到的各种传单小报中，能够保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冈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不够注意，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

## 一、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在开篇一章，作者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

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这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灾难。

接着，作者尖锐地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某一个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WG”中，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了极致，反毛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弥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作者全然不顾身家性命的安危，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WG”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指出，造成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WG”，是为了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政治目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1958年以来由于他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经过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反右派斗争，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以换取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党的领导人对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

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结果，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WG”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是《紧急呼吁》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WG”发生的国际背景，将6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指出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还对中国当时大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提出了大胆质疑。认为，中国党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化的。文章在这里所批评的，正是中共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急于护党弭乱的殷切心情。

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 二、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WG”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WG”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WG”的发动者引导“WG”所发动的群众，从“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路线斗争”

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对“W G”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清理不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走资派”。

对于毛泽东发动“W G”的非常之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深感天意难测，动辄得咎；就是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对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里，盲目跟从。在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转轨过程中，运动的群众动力也是在不断转换。到1966年底，运动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变化。运动初期一度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甩落下马，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着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参加运动的群众之间，立场和动机各异，对运动有着不同的认知理念和利益诉求。随着运动向“路线斗争”的升级，群众各派观点的对立也明确起来。所谓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别代表了群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的不同理念。这时，社会上明显偏离运动主航道的异端思潮也开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质疑这场运动的言论。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W G”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党团员是有“组织观念”的群体，在“W G”初期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各级党政系统瘫痪，党团组织停止活动，革命的政治光环戴到了“造反派”的头上。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由此引起了一批党内人士对这场运动的责任和抗争。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评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W G”。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W G”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详细考察“W G”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毛泽东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是完全如愿达到了目的，总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生发出新的事端。

这份《紧急呼吁》，就是普通党员抗议“W G”的代表作。它不仅弥补了“W G”思想史上在中共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W G”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如《紧急呼吁》关于“W G”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

此外，《紧急呼吁》中关于“W G”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

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执行了一条“唯我独革”的“左”倾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WG”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的非凡胆识。应该说，“WG”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问题严重的不乏其人。但当时反对“WG”的言论，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等。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甚至有些反对者仅仅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把“WG”的错误，直接归咎于毛泽东本人。作者把毛泽东发动“WG”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毛泽东发动“WG”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认为毛泽东发动“WG”，不是好心的昏聩，而是出自个人专断的需要。这从文章中用“独裁者”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WG”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阴谋论”的观点或许有简单化之嫌，但作者对“WG”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紧急呼吁》还认为，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政治措施，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号召向各级党政组织夺权等等，都是出自个人专断的主观动机。并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毛泽东应对“WG”这场政治动乱负主要责任，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 三、《紧急呼吁》的作者身份考

《紧急呼吁》的具名是一个共产党员。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状况又当如何？我们只能凭借在这两张薄纸上寻觅到的历史信息，对作者的情况进行一番考辨。

《紧急呼吁》是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文中充满了对乱党夺权者的义愤填膺，爱党护党之情殷殷可鉴，作者的政治身份应是共产党员。

再进一步分析：

1、从传单的品相看，《紧急呼吁》是张油印传单，共两张十六开的白色薄纸，对折为四页。这是“WG”传单通常的形式。从印制水平来看，这份传单当属下下品。首先是印刷效果不佳，满篇文字印刷得深浅不一，这应当是调墨不匀所致。在第一张的右页上方处，还有块字迹模糊的地方，显然是在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只有生手才会犯的低级错误。也可以想象出，作者在刻印时的紧张心情。

这份传单的印制之差，从它的刻蜡纸水平更能看出。字体虽还不失方正，但有许多笔划是反复刻划的，有多处划掉和涂抹的印记。还有几处是写完后又修改，用线条引添过去的字句。这是人们在纸上书写的习惯，却是刻钢板的大忌。略知蜡纸刻印的人都知道，刻字时的笔划反复是容易把蜡纸划破的。刻错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蜡纸上的刻错处用火烘烤一下，使蜡溶化开，就可以在原处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条蜡纸，贴在错误处，再用火烘烤，让蜡把错误处盖掉，就可以重新书写。这样修改下来，印刷出的材料非常干净，看不出修改。《紧急呼吁》的作者对这些技术常识一无所知，应是全然不懂蜡纸刻写和油印技术的新手。这份《紧急呼吁》，极有可能是作者刻写的第一份传单。

《紧急呼吁》写作在1967年2月。此时，“WG”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矿、农村，群众组织林立，小报传单满天飞。传单的油印技术很容易掌握。作者是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有心人，对“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运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居然对蜡纸油印技术如此生疏。似乎在这段时间里，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

2、从传单的文本看，《紧急呼吁》通篇用简体字，但也有一些是繁体字。如等闲的闲字，用的是“閒”；准备的准字，用的是“準”；关系的系，用的是“係”；发泄的泄，用的是“洩”等。《汉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并全面推行的。到1967年止，简化字的应用也不过十一二年的时间，在社会适应上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年纪大一些，已经熟悉用繁体字的人，要写出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体字的数目应该要更多些。如果在1955年后上学的人，使用简化字则会更彻底些。由此推断，传单作者多半是在建国后的教育体系下接受的语文教育，到推广简化字时应已有了小学文化程度，受教育期是正处于简繁字的过渡期。他应该是个成年人，估计年龄为30岁之上。

从文字表达能力上看，《紧急呼吁》是一篇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文章，但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却很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危机”写成“危急”，“袖手旁观”写成“抽手旁观”等等，表达意思的用词不当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法文法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顺，有的冗长罗嗦，有的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干脆就没有主语。另外，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段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整篇文章读起来非常拗口。就文字表达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

3、从传单对运动信息的掌握上看，《紧急呼吁》对“WG”过程的观察似乎有着视角距离的差异。文章中对文教系统的“WG”描述，比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临其境者。相比而言，作者对夺权的感觉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对造反派夺权的分析，除了一般所说的有“反分子”、“政治投机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还特别提到“落后群众”一类。他认为，“落后群众”参与夺权，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者对“文革”中参加夺权的群众是从近距离观察的，了解得比较细致具体。这个认识，应该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知性认识。这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的，应在企事业等基层单位有过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成年人。

《紧急呼吁》的作者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但政治理念没有摆脱当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文章的政治术语，沿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是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灌输的观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传单印制十分粗劣，文字表达能力非常一般。这说明，《紧急呼吁》无疑是草成的，没有经过多人的酝酿、推敲，没有事先拟定的底稿。作者和印制者应是一人。但文中多次出现“众所周知”，估计作者是和其他人在私下交流过对“WG”的看法，有着在私谊小群体中的共识。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对反右、大跃进有着深刻的印象，应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熟悉社会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但在政治上还没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论肝胆照人，有敢于担当历史的热血激情。从传单中简繁体文字混用的情况看，他的年纪应当在30岁以上，但也不会过大。

三、从《紧急呼吁》的话语系统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是五十年代前期入党的党员，对那时的好光景还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观点上，他与党内右派、中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应属于“漏网右派”和右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话，在大跃进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些。从见多识广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从上级机关贬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作者对运动信息的掌握并不很完全，不会是高层人士，也不会是来自文教系统，或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应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党员或干部。文中特别提到了，要寄希望于“光荣的工人阶级”，似乎表明作者有可能来自工矿企业或其他企事业单位。

笔者相信，《紧急呼吁》确是出自普通民众的手笔。实际上在百姓中，在普通党员中，尽管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但他们在生活体验中得来的思想认识，则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并不失洞悉历史的智慧。

礼失求诸野。从常识出发的思想，是最具有真实力量的思想。

〔作者简介：王海光：山东人，1954年生，硕士，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著有《旋转的历史》、《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林彪事件）、《从革命到改革》等专著，撰写过若干当代史研究论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书。〕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十七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时急（机）（1）……。

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危急，就是祖国所面临的危急。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绝不能等閒视之。

现在，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受着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各级党的组织和其它社会团体已处于瘫痪状态。

今天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党的核心骨干，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的解决『放』事业过雪山过草地立下功勋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今天却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

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各种书籍不加区别地被焚烧了，犹如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戏又在今天重演了。

我国著名的各种专家、学者，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支恶棒的打击下，在暴压面前走头（投）无路，不得不被迫自杀，而且已经自杀了。

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全国组织起了千万个“造反集团”，有一部分对我党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进攻着我们党各要塞……。这一可怕的事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有许多“造反”集团是一些反动分子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党政策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政治投机分子们的回避物（隐蔽物）。

现在党内一小撮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压力下号召着把我们党的各级要塞——从省、地到基层支部，一概让给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团……（虽然在这里有部分党员和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不理解这“造反”的真面目）当权者公开地号召破坏旧的国家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呢？全国一些“造反”集团在这种号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尤其是公然号召我们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去“帮助”清算我们党的“斗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痛惜。

###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来党的领导，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党内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一九五六（注：应为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进行了政治阴谋，六六年六月公开改组了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烂了”，全国各省市怎么会健全呢？当权者这种不安成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驱（先声）。

现在谁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那么，当权者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想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认识到了过去几年党所犯的政治错误是由于一人独断专行的共产党员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把从58年以来由个人的独断政策而集积（淤积）的各种不满转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个政治阴谋被八届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十六条》“合法化”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党中央的委员们，在正常的条件下，怎么能赞成把党内的斗争问题，



拿到党外去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能同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独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条”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又施放了另一个法宝——“炮打司令部”来补充其缺陷。

到今天谁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不是真正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因为用党内斗争不能清算反对派，所以独裁者用所谓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某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来由于自己错误政策造成的群众不满，在中央委员会内把自己的不利处境，用“群众路线”的手段去解决，这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阴谋。……群众路线的实施决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隐蔽『掩盖』它的违犯『反』。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特别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各种不满情绪的情况下，把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很容易利用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而造成人民的不满，对我们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另外，为什么“群众”显得把一个人的旗帜举得更高呢？这里有几种因素：

1、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党的集体领导，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以后这个成绩逐渐成为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崇拜，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别人，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颂，片面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认为某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错觉。造成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2、多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化了。他们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时，总是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只是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暂时的护身符。

3、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对独裁者表示支持，这（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开绿灯，顺利通过。

### 政策的实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领导所推行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证明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不能『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想把错误政策用一个过去的威望弥补掉。

我们党的领导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1、自然灾害；2、苏修的背信弃义；3、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这是我党领导欺骗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领导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被动的地位。

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我们党的领导，时时刻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动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个政治“动作”之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上，我们党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

地位上大大降低了，处于空前孤立。

在国际共运中，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当把党领导的霸权主义政策逐渐表面化的时候，我们党就开始丧失兄弟党对我党政策的信任。

我党与古巴、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使我党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众）所周知。

多年来我党领导政策的本质是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现在施行的一切为了战争准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理论的把握是 1.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和它的敌对矛盾仍然存在， 2.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着等……

这种理论的实质（战争）根据某二『疑为一』个人认为： 1.有可能把当权派多年所犯的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平反”掉； 2.能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看来每『某』些人认为“的”包括个人迷信在内的一切真理，在事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把越南问题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对越南战争我党的政策上看来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绝和一切反帝力量的并合行动，主观单独派遣军队等等。

最近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区『趋』恶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现着。如担心在越南达成和平协议……好像在越南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国军队赶出越南。

## 前 途

事实上，现在整个党，全体共产党员，“正处在”受到攻击而将要被“消灭”的紧急关头，各种政治投机集团企图“混水摸鱼”。目前的所谓“夺权斗争”就足以说明夺权的目的何在？众所周知。……当然也有我们党员和其他正直人。这些人现在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但是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掩盖可耻的政治阴谋，我们的部分党员、团员，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无意识地动员在这个可怕的运动里。

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寻找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努力着。

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二、当权的独裁者，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党外的斗争

重新纳入党内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呼吁公开揭露独裁者所犯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放弃党内斗争原则，去投个人之好，决不能（让）反动派抓去斗争的主动权。

进行公开的斗争是有流血牺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样白白失去党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祖国江山不知要强千百倍。

独裁者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路线继续执迷不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如果继续抽『袖』手旁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从此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抽（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

〔1〕 『』内是纠正白字，错别字；「」是补字。

来源：《往事》 第三十五期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

《往事》编者的话：正如评论者所言，《紧急呼吁》的许多观点与14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紧急呼吁》的作者直指毛是“独裁者”，其发动WG的动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是转移人们“各种不满”的“政治阴谋”。对这一点，《决议》的作者们不能说，不敢说，也不想说，个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虽“数易其稿，经过四千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以示庄重，但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紧急呼吁》的作者在论及建国后的实践时，其政治主体的所指界定不清：我们党——我们党的领导——“独裁者”三者之间不断滑动。这种表述上的混乱或许透露出作者内心的困境：如何把它们分开？如何厘清英明与荒谬、光荣与耻辱、正确与错误？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从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来看，这三者是无法分开的。这也是《决议》的作者们心里清楚的。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基层造反派的评价上：反动分子——落后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的严重错误不满的群众；或者：政治投机分子——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聪明”地“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的群众等等，简单的阶级斗争两分法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纠缠不清。

所有这些很概括的“印象主义”的表述都指向同一思想根源和体制性缺失。在这一点上，《决议》的作者们比《紧急呼吁》的作者要清楚得多，要不然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和他本人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的绝妙说法？

《紧急呼吁》的作者不明白，他对毛的“攻击”也是对他所忠于的党的“攻击”，而他所攻击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极致和必然结果。

当然，指出上述局限，完全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苛刻。WG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又有多少人

真正理解了WG的意义？当年，《紧急呼吁》的作者还年轻，历史的意义还未曾充分显露。如果他能够幸存下来，如果他仍能保持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他也许会摆脱掉那种鄙陋的、符咒般的、在现实中造成灾难的语境。而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残留着这种语境的痕迹。

~~~~~

## 【史海钩沉】

### “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

• 廖述江 •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毛泽东的对敌战略总结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天南海北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这一战略口号使全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

#### ◇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衅；侵略我国长达8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而此时，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美国还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窜扰我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在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

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 ◇ “三线”建设应运而生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此，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所谓“三线”建设是对国民经济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就是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一、二、三线的划分，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而“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为此，“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

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旦确定，举国上下即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行动起来，一时间“母亲送儿去远征，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再次上演。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纷纷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北、西南，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设。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国力单薄的情况下，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的需要建设的，建设规模大、战线拉得长，选点多在偏远山沟，布局分散又不合理，生产、生活设施简陋、标准低，有些企业还建在地质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

对于“三线建设”，素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闻名的毛泽东，这次却有些忧心地说：

“‘三线建设’搞不好，睡不着觉。”

由此可见，当时的“三线建设”对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对全中国是何等重要。为了让毛泽东睡好觉，建设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惟一的重要工厂）的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建设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一、二线的一些省区，根据中央精神迅速行动起来，发扬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的精神，组织精兵强将支援三线建设，并在自己的腹地山区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在随后的16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

“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后，国家为了让“三线”企事业单位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参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1983年国务院提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方针，对“三线”企业实施大迁移、大调整。直到今天，“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 举国备战，全民皆兵

为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了“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毛泽东重申1962年发出的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骨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第二是政治落实。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第三是军事落实。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要搞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196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泥足难拔。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在世界各地插手。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危险。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转移到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1969年下半年，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他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他提出，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他还说，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仅我们中央委员会，还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也有这个准备。此后，战备工作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战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等等。

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皆兵备战运动。

中国的紧张备战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反响。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但是，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无视事实，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办公，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前指”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全国全军备战活动逐渐走向缓和。

####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为增强我国抵御侵略的能力，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依据不同的安全形势，我国分别在东南沿海地区和“三北”地区构筑了完善的国防工事，使预设战场具备了能打、能藏、能机动、能指挥、能生活等基本功能。它的存在增强了我军战胜强敌的能力，成为我国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基于有备无患的考虑，从各个方面做好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乃至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为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雄厚的经济实力既是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也是巨大战争潜力的源泉。因此，搞好战略物资的储备，对增强战争潜力和遏制战争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重申，“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除了国家储备之外，还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储备粮食，实现藏粮于民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号召全国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和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历史地看，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和战争潜力，增强了我国抵御大规模入侵的能力，在防止爆发战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国家安全的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对此，毛泽东提出，要立足于大打、早打。这一估计，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已存在的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战备工作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69年6月，当时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

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论，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因此从1969年开始，便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搞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壕，建防空洞，修筑战备设施，储备粮食和布匹，形成了全民搞战备的运动。1969年12月，毛泽东指示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热浪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几乎各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

中国经济战略重点虽然转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不称霸却代表了中国的一种国际姿态，而这种姿态在今日依旧，从而保持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从1970年起，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衡发展。

□ 《党史文苑》 2006年第13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